



HINA

哈雷特·阿班 (Hallett Abend) 著 / 楊植峰 譯

採訪中國

《紐約時報》駐華首席記者阿班的
中國歲月 (1926-1941)

阿班在華十五年，後十四年供職於《紐約時報》。他從駐華北記者做起，迅速升任駐中國首席記者，管轄中國各地諸多記者站。他在華期間，適逢中華民國歷經多重巨變。北洋系統由盛及衰，國民黨一脈則隨北伐興起，並統一全國；歐美勢力在革命打壓下委頓，日本勢力則日益壯大。粗略數來，他的報導覆蓋了廣州革命風雲、北伐大業、東北易幟、蔣馮閻大戰、中東路戰爭、濟南慘案、九一八事變、西安事變……一直到上海孤島時代的最後一刻。可以說，中國歷史這十餘年的每一起伏、每一皺褶，無不通過他的鍵盤，傳遞到《紐約時報》，傳遞給美國大眾、全球大眾，並影響各國的政界決策及外交方略。

史家知道的中國現代史是乾枯的事實，而阿班提供的一個個側面，來自美國記者的獨特視角，鮮活得帶著汁水，而且向不為我等熟知，也不為我等常見，因而填補了空白，提供了參照，使歷史更形豐滿完整。

ISBN 978-957-32-6840-6 00420



9 789573 268406

N9062 遠流 NT\$ 420

建議分類：歷史傳記／新聞採訪

採訪中國

My Years in China, 1926-1941



哈雷特·阿班 (Hallett Abend) 著
楊植峰 譯

《紐約時報》駐華首席記者阿班的
中國歲月 (1926-194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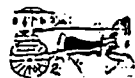
HINA

此書採回憶錄的形式，有見聞，卻不是見聞錄；有大量歷史片段，卻非歷史著作；有切身經歷，卻不是自傳；有逸事珍聞，卻不是掌故集。此書講的是美國式的新聞採訪實踐，而施展的場所，卻是變革方興的古老中國。……阿班以記者的親身體驗，寫出這採訪歷史中的一幕幕。讀下來，在看到歷史風雲的同時，也見識了歷史是怎樣被投射到傳媒。



實序





親切的、活潑的、趣味的、致用的

實用歷史叢書

※ 遠流出版公司

◎本書譯文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授權使用

採訪中國

《紐約時報》駐華首席記者阿班的中國歲月（1926-1941）

原書名——My Years in China, 1926-1941

作者——Hallett Abend（哈雷特·阿班）

譯者——楊植峰

主編——游奇惠

責任編輯——陳穗錚

發行人——王榮文

出版發行——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10084南昌路2段81號6樓

電話／2392-6899 傳真／2392-6658

郵撥／0189456-1

法律顧問——董安丹律師

著作權顧問——蕭雄淋律師

2011年9月1日 初版一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295號

售價新台幣 420 元（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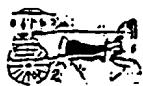
有著作權，侵害必究 Printed in Taiwan

ISBN 978-957-32-6840-6

YLib 遠流博識網

<http://www.ylib.com>

E-mail: ylib@ylib.com



實用歷史叢書

採訪中國

《紐約時報》

駐華首席記者阿班的中國歲月（1926-1941）

實用歷史叢書

出版緣起

王榮文

· 歷史就是大個案

《實用歷史叢書》的基本概念，就是想把人類歷史當做一個（或無數個）大個案來看待。

本來，「個案研究方法」的精神，正是因為相信「智慧不可歸納條陳」，所以要學習者親自接近事實，自行尋找「經驗的教訓」。

經驗到底是教訓還是限制？歷史究竟是啟蒙還是成見？——或者說，歷史經驗有什麼用？不可用？——一直也就是聚訟紛紜的大疑問，但在我們的「個案」概念下，叢書名稱中的「歷史」，與蘭克（Ranké）名言「歷史學家除了描寫事實『一如其發生之情況』外，再無其他目標」中所指的史學研究活動，大抵是不相涉的。在這裡，我們更接近於把歷史當做人間社會情境體悟的材料，或者說，我們把歷史（或某一組歷史陳述）當做「媒介」。

·從過去了解現在

為什麼要這樣做？因為我們對一切歷史情境（milieu）感到好奇，我們想浸淫在某個時代的思考環境來體會另一個人的限制與突破，因而對現時世界有一種新的想像。

通過了解歷史人物的處境與方案，我們找到了另一種智力上的樂趣，也許化做通俗的例子我們可以問：「如果拿破崙擔任遠東百貨公司總經理，他會怎麼做？」或「如果諸葛亮主持自立報系，他會和兩大報紙持哪一種和與戰的關係？」

從過去了解現在，我們並不真正尋找「重複的歷史」，我們也不尋找絕對的或相對的情境近似性。「歷史個案」的概念，比較接近情境的演練，因為一個成熟的思考者預先暴露在眾多的「經驗」裡，自行發展出一組對應的策略，因而就有了「教育」的功能。

·從現在了解過去

就像費夫爾（L. Febvre）說的，歷史其實是根據活人的需要向死人索求答案，在歷史理解中，現在與過去一向是糾纏不清的。

在這一圈圍城之日，史家陳寅恪在倉皇逃死之際，取一巾箱坊本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，抱持誦讀，讀到汴京圍困屈降諸卷，淪城之日，謠言與烽火同時流竄；陳氏取當日身歷目睹之事與史實印證，不覺汗流浹背，覺得生平讀史從無如此親切有味之快感。

觀察並分析我們「現在的景觀」，正是提供我們一種了解過去的視野。歷史做為一種智性活動，也在這裡得到新的可能和活力。

如果我們在新的現時經驗中，取得新的了解過去的基礎，像一位作家寫《商用廿五史》，用企業組織的經驗，重新理解每一個朝代「經營組織」（即朝廷）的任務、使命、環境與對策，竟然就呈現一個新的景觀，證明這條路另有強大的生命力。

我們刻意選擇了《實用歷史叢書》的路，正是因為我們感覺到它的潛力。我們知道，標新並不見得有能力，然而立異卻不見得沒收穫；刻意塑造一個「求異」之路，就是想移動認知的軸心，給我們自己一些異端的空間，因而使歷史閱讀活動增添了親切的、活潑的、趣味的、致用的「新歷史之旅」。

你是一個歷史的嗜讀者或思索者嗎？你是一位專業的或業餘的歷史家嗎？你願意給自己一個偏離正軌的樂趣嗎？請走入這個叢書開放的大門。

譯者序

關於本書作者哈雷特·阿班（Hallett Abend, 1884-1955，亦譯作「亞朋德」），日本的松本重治在《上海時代》（上海書店出版社，二〇〇五年）中作了如下描述：

在所有美國新聞記者中，我認為最為傑出的要推《紐約時報》的哈雷特·阿班。由於阿班常年駐中國所積累的經驗，以及他頗為老成的待人接物，加上又有時報的聲譽，所以他的交友相當廣闊。他與蔣介石夫人宋美齡也是極為親密的友人。他不用像我這樣，身為日本通訊社記者，每天都必須為早晚兩次的報導發稿而疲於奔命。他只需揀一些重大的信息加以傳送即可。所以說他是處在一種極為有利的位置上。我雖然身在上海，始終關心美國的對日政策及對華動態，所以常與阿班交換意見與情報。

他是獨身，在外白渡橋附近新建的布羅托多威公寓①包下了最高一層，找了幾個年輕助

手，在那裡悠然自得地工作著。有時，我約他一起去江灣的高爾夫球場打球。一次，一局未完，他突然想起什麼事情對我說：「真對不住，我忘了還有約會，今天就失敬了。」我半開玩笑似的問他：「還能有什麼事比打球更重要？」「實際上我忘了今天宋美齡要請我喝茶。請務必多多包涵。」他連打招呼。聽他如此說，我想可不能影響朋友的工作，便只能讓他這麼離去了。這兒也多少可以看出，宋氏一家極為重視與美國的關係。

上世紀三〇年代，在駐華外國傳媒中，阿班的地位首屈一指，因他代表的是《紐約時報》（*The New York Times*）。報紙在西方輿論界本就一言九鼎，記者的人品操守又讓人起敬。西安事變發生後，蔣介石的洋幕僚端納（William Henry Donald, 1875-1946）趕赴西安調停，向新聞界發出的電報，頭一個對象便是阿班。這在澤勒（Earl Albert Selie）的《端納與民國政壇秘聞》（湖南出版社，一九九一年，原書名 *Donald of China*）中便有記載。

阿班一八八四年生於美國俄勒岡州（Oregon）波特蘭市（Portland），卒於一九五五年，一生未婚，無子嗣。阿班向不喜循規蹈矩的生活，一九〇五年，在史丹佛大學剛念到三年級，便輟學到社會混，謀了一份實習記者職位。來華前，他在美國報界已足足浸淫了二十一年，最高職位做到總編。這期間，阿班不會考慮娶妻生子，只管頻頻跳槽，還會隱入山林寫作，總之，任何一成不變的日子，都讓他深惡痛絕。這麼折騰到四十歲出頭，竟又突發奇想，要到遠東一闖天下，就這麼來了中國。

阿班在華十五年，後十四年供職於《紐約時報》。他從駐華北記者做起，迅速升任駐中國首席記者，管轄中國各地諸多記者站。他在華期間，適逢中華民國歷經多重巨變。北洋系統由盛及衰，國民黨一脈則隨北伐興起，並統一全國；歐美勢力在革命打壓下委頓，日本勢力則日益壯大。粗略數來，他的報導覆蓋了廣州革命風雲、北伐大業、東北易幟、蔣馮閻大戰、中東路戰爭、濟南慘案、九一八事變、西安事變……一直到上海孤島時代的最後一刻。可以說，中國歷史這十餘年的每一起伏、每一皺褶，無不通過他的鍵盤，傳遞到《紐約時報》，傳遞給美國大眾、全球大眾，並影響各國的政界決策及外交方略。

二〇年代起，湧入中國的西方記者如過江之鯽，但就當時的社會地位而言，無人可望阿班項背。阿班生性爭強好勝，在第一線拚搶突發事件，人所不及，但他的真正優勢，還在於廣泛的上層關係。中國政府高層及日、美、英、蘇等國在華最高層裡，盡是他的私交。國民政府初期想逐他出境，弄到後來，四大家族竟都奉他為上賓。日本方面更重視，文武各派各系的最高頭目，恨不得把他門檻踏破。蘇聯也有趣，一邊掀起批判阿班浪潮，一邊派大使與他密談，託付他轉達高層意思。至於美英方面，自不待言了。阿班之重要，在於他的作用已完全超出了區區記者的層面。對美國政府而言，他是個不支薪的高級情報員，免費提供絕密情報，分量超過任何正式間諜。對其餘各國政府而言，他是個編外的美國外交官，其作用，常常是美國大使所不能及。因此，日美之間、中美之間、蘇美之間，都要由他來頻頻傳話。至於各國的內鬥，也要向他暗洩天機，好登上《紐約時報》，搞亂對方。比如，日本正式加入軸心國前，即因最高層兩派對峙，有

人將消息暗中相告，使他平白得了一個全球超級獨家新聞。這一切當然有賴《紐約時報》的金字招牌，及其取之不盡的資源。

駐上海的外國記者中，以阿班的陣仗最大，居則百老匯大廈頂層，行則車夫駕新款轎車伺候，玩則江灣高爾夫球場，飲則英國總會、花旗總會。手下記者、助理無數，僕役成群，保鏢隨行。豪宴酒會裡，他時而主人，時而座上賓。亞洲各地，只要認為必要，便可隨時豪華出行。《紐約時報》的金庫為他安了龍頭，需要時，只管擰開便是。他在北京^②、上海的日子，與其說是記者，不如說是王公，寒酸的同行人們，誰能與他爭鋒。

《紐約時報》駐中國各地（含香港）的記者站，無論財政、人事及報導業務，均歸上海分社的中國首席記者統管。阿班自一九二九年起便任駐華首席記者一職，前後凡十二年。《紐約時報》總編及發行人的職位迭有更替，他的位置卻穩如泰山，皆因業務精湛全面，難以隨意取代。一九四〇年，阿班終於離華，卻不是總部將他調回，而是架不住日本人屢下毒手，企圖對他實行肉體消滅，以至美國亞洲艦隊司令哈特（Thomas Charles Hart, 1877-1971）看不過眼，逼其走避。

阿班一生除新聞報導外，著述也豐。第一本書為一九三〇年出版的《苦難中國》（*Tortured China*），最後一本為一九五〇年出版的《一半人為奴，一半人自由：這割裂的世界》（*Half Slave, Half Free: This Divided World Abend*），凡十一種。其中不得不提的，是一九四七年出版的《華爾傳》（*The God from the West*），該書早已由雍家源先生翻譯，收入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

出版的《太平天國史譯叢》。因流傳不廣，可能知者寥寥，否則的話，近年寫到洋槍隊及華爾（Frederick Townsend Ward, 1831-1862）的作品，應不會如此信口雌黃，令人詫愕。阿班半途輟學，以後也不見受過史學訓練，平日裡忙於採訪，不想治起史來，其謹嚴深厚，已遠遠超出一般史學票友水平。華爾死於寧波後，全世界研究他的著作，屈指可數，出自國人之手的，一本沒有。好在有阿班的《華爾傳》在，這段歷史，才有血有肉。這本書的撰寫過程，也歷經坎坷。全書殺青後，唯一的手稿還未及送交紐約的出版社，便於一九四〇年被日本憲兵入室搶走，十個月的努力毀於一旦。日人的惡行，使該書的出版推遲了七年，也使阿班多受了一遍寫作之苦。這段經過，於本書中有詳細描寫，這裡略費筆墨，交代背景。

《採訪中國》（編按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簡體中文翻譯版書名為《民國採訪戰》）原名為《我的中國歲月》（*My Years in China, 1926-1941*），有些版本亦作《中國十五年》（*15 Years in China*）。書出版於一九四四年，即他去華後四年。全書分三卷，三十六章，外加後記一篇，譯成中文約二十萬字。外國記者關於中國此段歷史的著述不少，但松本重治講歷史，白修德（Theodore Harold White, 1915-1986）講政治外交，史諾（Edgar Snow, 1905-1972）、福爾曼（Harrison Forman, 1904-1978，著有《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》，原文 *Report from Red China*）講見聞，都與阿班的書不同。阿班此書採回憶錄的形式，有見聞，卻不是見聞錄；有大量歷史片段，卻非歷史著作；有切身經歷，卻不是自傳；有逸事珍聞，卻不是掌故集。此書講的是美國式的新聞採訪實踐，而施展的場所，卻是變革方興的古老中國。自由主義的新聞觀念及美式的採訪

操作，處處與中國現實起碰撞衝突。西方記者的常規技能，不足以應付中國的情況，他必須去應對，去適應。有時使狠，有時使巧，有時妥協，卻要死守真實與公正的底線。他以記者的親身體驗，寫出這採訪歷史中的一幕幕。讀下來，在看到歷史風雲的同時，也見識了歷史是怎樣被投射到傳媒。筆者見識有限，涉獵的書中，如阿班此書的還有待發現。

這十五年裡，阿班直接接觸的中、美、日名人政要，比比皆是。他打過交道的著名中國人，有蔣介石、宋美齡、宋子文、唐腴臚、梅蘭芳、孔祥熙、陳友仁、張作霖、張學良、張宗昌、王正廷、吳鐵城、胡適、顧維鈞、伍朝樞、李宗仁。西洋人士中，著名的有鮑羅廷（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, 1884-1952）、端納、司徒雷登（John Leighton Stuart, 1876-1962）、林白（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, 1902-1947、首位環球飛行家）、馬慕瑞（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, 1881-1960、美國公使）、顏爾露（Harry Ervin Yamell, 1875-1959、美國亞洲艦隊司令）、哈特（美國亞洲艦隊繼任司令）等。另有大批美英人士，包括駐華的美英軍旅高層、外交官、新聞從業者、租界官員、間諜等，也在阿班筆下一一登場。他們雖不為國人熟悉，卻是中國現代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阿班與日方各種人物的交道，更是精彩紛呈。他筆下涉及的日本人，包括日本外相松岡洋右、駐華公使重光葵、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、駐華艦隊總司令鹽澤、日本的無任所公使伊藤、南遣艦隊司令官岩村清一、日本第二艦隊司令長谷川中將、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及其手下橋本欣五郎大佐等。他對南京大屠殺首要責任人松井石根落墨尤多，許多細節國內出版物中

罕見。一般認為，松井及手下八十軍官被日本召回，是因為南京大屠殺後對日負面報導過盛，而讀了本書後即知道，其主要原因，還是與美艦帕奈號（U. S. S. Panay）在長江被日機擊沉有關。而拖松井石根下馬的報導，正是出於阿班之手，發表於《紐約時報》，並造成轟動。對於一千下等的日本角色，阿班也作了描繪，其中有狡詐，有忠厚，有愚鈍，有精明，有凶悍，有溫良……不再千人一面，誇張失真。

阿班加盟《紐約時報》前，曾短暫主持英文的《北京導報》（*The Peking Leader*）。該報的出版人是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，總編是美國人柯樂文（Guover Clark, 1891-1938）。《北京導報》是二〇年代北京僅有的兩份英文報之一，陣地雖小，卻各方爭奪。明裡由教會資助，暗中又收受顧維鈞、馮玉祥和蘇聯人的津貼。該報在現代中國新聞史上地位雖有限，卻為在華的國際媒體輸送了兩位關鍵人物：一為《紐約時報》駐華首席記者阿班，一為風頭極健的路透社（Reuters）駐華記者趙敏恆。本書未提及的是，阿班離開該報後，柯樂文又去紐約尋來趙敏恆接任。由於報紙規模局促，兼之柯樂文人品有缺，阿班及趙敏恆均未久留。本書對《北京導報》之運作及柯樂文的為人皆有生動描寫，可資研究北京早期英文報業者參考。

阿班一邊講述新聞的採寫，一邊帶出歷史細節。許多資料是罕見的，因而珍貴。關於孫中山死前向美英求助一事，他從美國駐廣州領事館採得了第一手資料，是全球報導此事的第一人；濟南慘案發生時，阿班是置身現場的唯一非日籍記者，對事件的陳述，具極高史料價值；九一八事變前，阿班事先得了日本人的提示，走遍東北，最早作了預報。

關於中美兩國關稅條約的簽署，阿班也為讀者補充了細節，正是由於國民政府行政無序，美國政府雖主動提議將關稅自主權歸還中國，卻被有關部門誤置十八個月，不獲高層所知。直至宋子文與美國公使馬慕瑞碰頭時，才知此事存在，於是加緊簽署。故而《整理中美兩國關稅關係之條約》是由財政部長宋子文簽署的。而與其餘列強間的新關稅條約，均由外交部長王正廷簽署。

對於鮑羅廷的外表，阿班作了極生動的描述。在中國革命史中，這位蘇俄顧問的作用舉足輕重，提到他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，但絕大多數面目模糊，唯有阿班作了目擊者的描寫。他還寫了顧維鈞的暴跳和無奈，張宗昌的奢靡與殘暴，宋子文的堅韌與精幹，張學良的沉湎和昏庸。在中國官員中，他對宋子文著墨最多，評價最高，認為他無論政見人品，都可躋身世界偉人之列。

他動員《紐約時報》援救胡適出獄一事，國內歷史著作中，也罕有提及。胡適在中國公學任校長時，因在《新月》連發三篇重要文章，觸怒國民政府，終於被逮捕。因有消息傳出他將遭槍決，阿班氣急攻心，動員時報總部發表長篇社論，譴責國民政府暴行。他將社論迅速翻譯成中、日文，耗費大量金錢，將社論以電報發送到遠東所有中、日、英報刊轉載，形成鋪天蓋地的譴責之勢，終於迫使國民政府收回屠刀，將胡適釋放。

西安事變的報導，是阿班的又一場漂亮仗。事變發生當日，阿班便憑他與蔣、宋、孔、陳的交情，為《紐約時報》搶到了全球的獨家新聞。新聞史常說，最先報導西安事變的，是路透社的趙敏恆。但趙敏恆是靠嗅覺推斷，最多是猜測，阿班則報導了宋子文及端納的親口引述，鐵證如山。此事的發現，極具戲劇性，也得益於他在人脈上的無敵。那晚，他因缺新聞而苦惱，便隨意

打電話給宋子文，不期宋子文已外出，傭人說是去孔祥熙家。他又給蔣介石顧問端納去電話，沒想端納也不在酒店，秘書同樣說他在孔祥熙家。於是，他馬上撥電話到宋美齡公館，傭人說，蔣夫人剛離開，去了孔祥熙家。他至此已嗅到有重大事情發生，馬上一遍又一遍撥打孔祥熙家電話。撥了無數次後，終於有傭人接聽電話，讓他找到了端納和宋子文。宋子文親口將蔣介石被扣的事告訴他。一個驚天大新聞，一個無與倫比的獨家消息，就這麼迅速誕生了。松本重治在《上海時代》有專門一節「協助《紐約時報》」描述此事，他寫道：「這是第一個外國新聞社上海記者對西安事變的報導。」

關於宋美齡的《西安事變回憶錄》，我們從書中得知，手稿的寫作始於一九三七年年初。宋氏著手寫作此書時，便有意售予出價最高者，將所得設一基金，用於西安事變被害衛隊成員遺孤的教育。而出價最高者，正是阿班。他代表北美報業聯盟，以一萬兩千美元從宋美齡手中購得此書的版權，在北美發表。宋美齡的原稿為英文，我們今日讀到的中文版本，即是阿班所購英文版的譯文。

西安事變後，阿班在杭州拜訪了蔣氏夫婦，並以帶引號的直接引語形式，錄得蔣介石對西安事變經過所作的親口回憶，而現場翻譯為宋美齡。此段回憶，與實際經過，應是最為貼近的。

有些歷史事件，在中國長期受忽略，阿班的書便起到鉤沉的作用。比如，世界環球飛行之父林白到訪中國一事，歷史性有之，戲劇性有之，我們卻大多不甚了了，《採訪中國》裡便有詳細記載。